

# 發展社會學對國家發展的

## 理論詮釋

陳文政

壹、前言：發展社會學主要理論形成之歷史背景  
貳、社會結構分化與個人現代性：現代化理論觀點  
參、擺脫依賴制約自主發展：依賴理論的觀點  
肆、世界體系結構中地位的躍昇：世界體系理論的觀點  
伍、結語：多重觀點的概念架構  
釋

## 壹、前言：發展社會學主要理論形成之歷史背景

由大多數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所組成的第三世界（註一），在國家發展的歷程中，具有共通的歷史背景和政經經驗：（一）多數曾被歐洲殖民帝國所宰制；（二）大部分於二次大戰結束後獲得獨立；（三）多數國家經濟貧困，有待已開發國家之援助。當其時，以資本主義及自由民主為特徵的第一世界和以共產主義制度為特質的第三世界，卻壁壘分明地對峙著。

發展學者對國家發展問題之研究，主要源自對第三世界國家戰後發展問題之關注。何以學者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興起研究動機呢？此與戰後國際政經情勢的變化有關。

首先是歐洲殖民帝國的衰亡。前述第三世界多數國家曾受歐洲殖民帝國宰制，戰後這些殖民帝國內因耗損嚴重，外遭反殖民地運動打擊，已失去其在舊國際政經體系中之優勢。然而，新興獨立國家在掙脫宰制後的首要課題便是如何建國與發展。

第二，社會主義勢力的抬頭，對自由世界威脅日增。西方世界為防堵共黨勢力擴大，危及自身安全，亟欲拉攏第三世界國家，因而日愈重視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

第三，西方國家逐漸意識到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政治中之重要性。諸如在聯合國的表決、戰略地位、廣大商品市場及豐富的原料供應等，皆提高了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問題之研究興趣。

第四，美國為維護其國家利益，亟須一個穩定的世界秩序。然而，第三世界國家的動亂和貧窮卻給美國帶來威脅，因而，如何促成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國家穩定亦為美國所重視。

由於上述背景，一批美國的政治菁英及社會科學家們，在政府和私人機構支持下，將研究的重點與興趣集中於亞、非、拉丁美洲等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與文化的變遷。（註二）然而，美國知識分子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問題及歷史經驗未有深入理解，在無既有理論或經驗研究指引之情況下，他們遂以自己所熟知的西方概念及理論架構，作為理解第三世界國家之基礎。準此，他們認為，只要依照西方國家發展模式加速前進，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終究是成功的，此即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形成之背景。

迄至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由於美國國內問題叢生，引發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之質疑。同時，在戰後南北半球的經濟對抗中，南半球國家總處於劣勢，使南方國家亟思突破北方國家所建構的自由貿易體制，冀以建立一個能符合他們所需要的公平貿易。（註三）此乃引起某些歐美及第三世界國家中知識分子對現代化理論之批判與反省，並試圖找尋可能的解決方案。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及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即在此情況下發展出來的。

本文旨在探討上述三個理論對「什麼是國家發展」及「如何促進國家發展」兩議題之理論詮釋。

## 貳、社會結構分化與個人現代性：現代化理論的觀點

現代化理論源於新演化論 (Neoevolutionism) 和結構功能論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而其方法論主要立基於二分法 (Dichotomy) 的概念和聚合理論 (Convergence theory)。

新演化論出現於二十世紀中葉，它修正了十八、十九世紀舊演化論的部分觀點，如以「社會」或「文化」來代替「全人類」、拋棄舊演化論「道德式」的進步觀、採用「分化」(Differentiation) 與「整合」(Integration) 等概念來分析社會演化的不同階段，以及不再強調人類進步的觀念而重視「社會適應力的提升」。(註四)

結構功能論的中心論題是功能，其研究的單位則是結構。所謂功能，依帕森思 (Talcott Parsons, 1902--1979) 的說法，是指控制體系內結構與過程之運行的一些條件。這些條件影響到體系的穩定、存亡、以及體系運行的持續性長短問題；(註五) 結構則指一個有機體系中各部門間之關係。功能學者認定社會體系中各部門間是相互關聯的，整個體系基本上是整合的 (Integrative) 與穩定的，其運作則朝向均衡 (Equilibrium) 狀態。由於體系內各部門相互關聯，故不能單獨將某一部門與整體分開來研究。在整合與均衡原則下，任何一部門發生變遷必將牽引其他部門之變遷，以重新朝向社會的整合與均衡。

現代化理論所襲用之二分法概念，可源溯至十九世紀傳統理論家們的兩極理論 (Bipolar theories)，他們通常偏重於對歐洲從封建農業變到資本工業秩序的理解，較少顧及對整個人類歷史的關照。此外，他們更採用一種「前與後」(before-and-after) 的模型，用不同的名詞與價值尺度來描繪各階段的起始與終點。(註六) 如史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895) 的軍事社會與工業社會，敦尼斯 (Ferdinand Toennies) 的社區與社會，以及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的「機械」與「有機」連帶等。隨後，美國的社會科學家亦將此一概念加以引用，最後則由帕森思的模式變項 (Pattern variables) (註七) 總其成，並且影響了後

來的現代化研究者，而有了「傳統」與「現代」之區分。

此外，聚合理論的觀點亦為現代化理論所引借，它基本上認為：(一)不論社會發展的起點或中介途徑 (Intermediate route) 如何，所有社會都將朝向同一終點改變；(二)無論在現代化過程中，遭遇何種障礙與困難，最後的成功是保證的。(註八) 這種論點使現代化研究者相信，現代化就是社會發展的目標，而且成功是可期的。

在理解現代化理論的學術淵源和方法論之後，接著可以進一步探討該理論詮釋「國家發展」的兩個重要概念，即「社會結構分化」與「個人現代性」。

### 一、社會結構分化

早期的結構功能論者並不注重長期社會變遷之研究，他們視結構分析為要務，帕森斯曾說：「結構分析理當先於社會變遷過程的分析。」(註九) 雖然如此，功能學者對於體系內的變遷則有所闡述，例如，帕氏曾以緊張 (Strains) 與差異行為來描繪，指出社會體系中，角色間之互動常因未能符合角色期望，或因角色模糊、角色衝突而產生緊張。緊張結果產生差異行為，需用有效的社會控制。社會控制之結果導致體系的變遷。

然而，這種努力並不能使功能論的整合與均衡概念免遭抨擊，於是，帕氏在晚年更進一步融合了演化論來解釋長期的社會變遷與發展。他提出四個進化的過程，即分化、適應力升等 (Adaptive upgrading)、容納 (Inclusion) 與價值通則化 (Value Generalization)。(註一〇) 分化是一個體系中之單位或結構分解成二個或二個以上之單位或結構。新分出的單位或結構的功能與特質異於原有之單位或結構，其適應力較高；分化的結果便是適應力的升等；容納的過程係將傳統以個人地位背景為標準的社會組織加以擴大以容納各種各樣的人群，用以穩定社會之基礎；價值通則化則指社會對新分化出的單位之承認與容納。(註一一)

此後，功能學者如史美舍 (Neil J. Smelser)、默爾 (Wilbert E. Moore)、艾森斯達特 (S. N. Eisenstadt) 等，對於大規模社會變遷的解釋，便以分化、再整合 (Reintegration) 及適應 (Adaption) 三個基本

概念爲主要依據。不但如此，他們更將此三個概念運用到對現代化過程的解釋上。

分化指一個社會單位被分解爲二個或二個以上的新單位。它是不可避免，而且是不可逆轉的；在歷史變遷中，分化是主要原動力。（註一二）不過，分化過程中也可能產生衝突與問題，必須運用新的工具（如新意識的形成和政治制度的有效運用）來加以整合。分化與再整合後的社會對於自然的適應與控制將更強化。

現代化論者採用分化、再整合、適應等概念來解釋發展，認爲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發展，是經由分化與整合的漸進過程，此一過程使得整個社會在性質上變得更爲分殊細緻，在功能上則更趨於專門化，而且新分化的單位，其功能比舊有的更爲提升。以分化概念爲基礎的社會理論更進一步指出，社會在某點上所遭遇的壓力，必須由專業化與分化去克服，專業化與分化則進一步引起社會整合問題，需由新生的互賴關係網絡來解決。結果，發展的過程使社會變得愈來愈複雜，愈來愈系統化。（註一三）因此，一個社會結構分化情形愈複雜細緻的國家，是發展程度較高的現代化國家。

總之，以社會結構分化的概念來解釋國家發展，認定一個國家中之社會結構分化程度愈分殊細緻，則發展程度愈高。

## 二、個人現代性

現代化理論詮釋「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個人現代性」。此種觀點基本上認爲，要國家現代化必須先有現代之國民，換句話說，現代國民是國家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持這種觀點的現代化研究者，從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中之主題得到啓示，把發展問題當做價值的研究。（註一四）他們並且希望藉著對個人現代性的特徵，來瞭解爲何有些國家能迅速發展，有些卻停滯不前或者速率緩慢？國家發展之動力來源何在？動力之性質如何？

心理學者從事實驗，以鑑定一種所謂「心理微菌」（Mental viruses）的東西，它是一種罕見的思維方

式，一旦發生於個人心理之中，便能激發特別奮發的行動；它被稱爲「成就需慾」(N-achievement)，是個人思想中想「做好事」或「做得比以前更好」的念頭，在國家現代化中，它是一種極主要的因素。

麥克里蘭 (D. C. McClelland) 曾就一國中國民學校兒童讀本之成就需慾成份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成就需慾成份大者，經濟進步亦快。此外，麥氏亦提及現代化的另一心理因素，那就是公益責任感，是一種民胞物與的襟懷。(註一五)

經濟學者海根 (E. E. Hagen) 從另一研究途徑來探討經濟發展中的心理因素。他提出一種「從尊重地位引退」(Withdrawal of status respect) 的理論(註一六)，認爲每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都是富有創造性的少數人所發軔的。

至於，殷克里斯 (A. Inkeles) 和冷納 (D. Lerner) 等則針對現代個人特質，提出一些現代人的理念型 (Ideal type) (註一七)，用以識別現代人的態度和觀念。

以上兩種詮釋國家發展所著重之層次雖然不同，但是在「傳統——現代」兩極模式的前引下，它們都將發展將視爲是一個有先後次序的連續過程；而國家發展便是一個國家中的社會結構與個人特質，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變遷過程。從而，現代化論者對於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與個人現代性都曾給予相當多的關注。

在社會結構現代化方面，歸納言之，約有下列幾項指標：

- (一) 工業化。
- (二) 科學化。
- (三) 制度化。
- (四) 專業化。
- (五) 世俗化。
- (六) 民主化。
- (七) 社會流動化。

(八)效率化。

(九)國家統一。(註一八)

(十)教育普及化。

在思想行爲方面，現代人的特質包括：

(一)具有開放的心靈而願意接受新經驗。

(二)勇於表示意見但也具有民主容忍的風度。

(三)做事情有計劃並注意時間與效率。

(四)信賴科學技術但不迷信盲從。

(五)強調個人尊嚴並崇尚公平分配。

(六)用人唯才，不講究出身背景。(註一九)

此外，現代化理論在詮釋國家發展時，對於國家發展的本質、軌跡、障礙、途徑等亦有所主張。就國家發展本質言，現代化理論認爲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的發展是相同的，兩者都是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而發展的軌跡是呈單線進化的；發展的障礙是該社會之結構與傳統文化；而發展的途徑則必須向西方學習。

### 參、擺脫依賴制約自主發展：依賴理論的觀點

前述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因美國海外政策失利，第三世界實際發展經驗挫敗，以及戰後南半球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所處的劣勢地位等因素，以西方發展模式爲主要立論根源的現代化理論，開始受到第三世界（以拉丁美洲爲主）國家政治領袖及知識分子的批判與質疑。他們大量採用「依賴探究法（Dependency approach）的分析方法，針對拉丁美洲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問題進行研究，並試圖提供一種替代性的觀點以取

代現代化理論對落後國家發展問題的主張，後來更形成所謂「依賴理論」或「依賴學派」。

依賴理論對國家發展問題的探討，將焦點放在整個世界經濟結構上，旨在闡明國際社會中第三世界與先進國家的互動，並據此提供發展的策略。依賴論者在研究文獻中指出，先進國的發展造成第三世界的低度發展，第三世界國家必須打破依賴制約，才能獲得真正發展。

### 一、依賴產生低度發展

「依賴」在依賴理論中是個重要的詞彙，根據鐸山多士（T. Dos Santos）的定義，「依賴」是指一種情境，在這種情境中，某些國家的經濟為其他國家經濟的發展與擴張所制約，而且前者受制於後者。」（註二一）簡言之，即一國經濟受他國經濟發展與擴張所制約之情境，便是「依賴」。

就一般語意而言，依賴並不一定會產生「不利」的結果，例如，兒裡對父母親的長期依賴（多方面的），對於未來的獨立或發展便少有「不利」的影響。但是，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依賴論者認為，一國對於他國之依賴，必然產生「低度發展」；而所謂低度發展，實表示一種「特殊的剝削關係——即強國剝削弱國。」（註二二）它是資本主義的負面結果。（註二三）

依賴論者運用「中心——邊陲」（Center--Periphery）或「都會——衛星」（Metropolis--Satellite）以及「發展——低度發展」（Development--Underdevelopment）等概念架構（The conceptual framework）來分析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把世界經濟體系分成兩極化，一為發展的「中心地區或都會地區」，另一邊為低度發展的「邊陲地區或衛星地區」。這種「都會——衛星」或「中心——邊陲」的關係不但存在於世界的層次，而且存在於拉丁美洲國家內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這些國家的金融和出口中心是世界經濟體系中心都會的衛星，然則對國內人口和生產區而言，卻是中心都會。這種都會和衛星的連鎖關係使該體系內的每一部分都能緊密的扣連起來，（註二四）形成一個牢固的聯結。在此聯結中，每個衛星一面吸取其本身衛星的資本和經濟剩餘，一面又將此部分剩餘輸送到世界都會中心去。於是，世界都會中心的發展愈來愈順遂，而邊陲地區的低度發展則日益嚴重。



邊陲地區因依賴中心地區而肇致的低度發展，從某一觀點看來，可以從國際階層化形成的歷史過程，即西方的重商資本主義（Mercantilism）、殖民主義（Colonialism）和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歷史過程加以理解。

約自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末期，歐洲雖擁有軍事優勢與武力科技，但是在物質擁有上卻異常貧乏，因之乃不得不挾其武力優勢向外擴張，他們的目的在尋找奴隸、香料和黃金，以及征服當時的貿易路線。

歐洲將對亞、非及拉丁美洲的掠奪、奴役和謀殺所得的寶物財貨運回母國，並轉化為資本。（註二五）此外，尚配合當時歐洲有利的社會文化條件，如尊重工匠的傳統、獎勵專利權的制度、工廠制度、都市生活、民主政治、農業革命、蒸汽機的發明、新教倫理的發揮等，因而社會得以迅速躍昇。相對地，在此一時期中，亞、非及拉丁美洲等地區，卻因經濟上一再喪失剩餘，而失去經濟了進步的機會，並遏止了進一步的內在發展。此外更造成人口、經濟與政治三方面的衰退。（註二六）

殖民主義時期的特徵，主要表現於歐洲為控制其產品的市場出路，以領土征服和更精密的管理體系等手段，使殖民地之社會經濟組織更適合母國需要的過程中。為了使低度發展地區更能符合母國的需要，殖民帝國進一步將自己的生產方式、社會組織的形式，甚至於文化理想和政治、法律結構等傳授給對方。（註二七）在此一情況下，殖民地經濟便不由自主地被整合到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陷入低度發展的情境。本期殖民地經濟低度發展的過程，主要透過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經濟的鉗制方式而逐漸形成的，其主要鉗制方式如下：

1. 稅制的建立使殖民地被納入貨幣經濟之中，且不得受殖民帝國資本主義核心市場波動的支配，終使自足的農村社經單位開始崩潰。

2. 殖民帝國對殖民地原料和農產的產銷，加以直接組織，以供給其進一步工業擴張之需。

3. 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市場壟斷，使殖民地本土工業遭受扼殺的命運。

4. 調整殖民地貨幣以配合殖民帝國之需，並使兩者之間的通貨保持穩定的關係。

新殖民主義是二次大戰後，一種非賴直接政治控制的經濟殖民主義，目的在維持母國對原有殖民地經濟的控制與影響。它可從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對落後國家的影響加以理解。（註二八）

多國公司對落後國家的主要影響是造成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停滯與所得分配不均的惡化。它利用低度發展國家的低廉生產設備與勞力去製造產品，從而獲取暴利。此乃多國公司以利益取向的本質。

爲了持續其本身的利益，多國公司以控制資本與技術爲手段，使其在國家工業化中之地位得以正當化。然而，它卻不依國家發展的藍圖來使用資源，致滯礙了國家自主發展目標的達成。此外，它以優越的條件來打擊國內本土企業，進而威脅其生存，使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到阻礙。

由於多國公司所用的是資本密集的技术，大多傾向於節省人力，結果造成當地失業問題相形惡化，此時政府若未能即時提出技術轉移計劃，最後終會使得所得分配日趨惡化。（註二九）此外，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強調個人消費的意識型態，對於落後地區的國家發展產生扭曲作用。

上述國際階層化的歷史過程，就依賴論者看來，也可以說是落後國家依賴中心國家的歷史過程，它有三種形式：即（一）殖民式的依賴（Colonial dependence）；（二）金融與工業的依賴（Financial-industrial dependence）；（三）科技與工業的依賴（Technological-industrial dependence）。（註三〇）

總之，依賴論者認爲，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的互動，由於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之擴張，因受制於先進國家而形成依賴關係。在不平等交換（Unequal exchange）過程中，落後國家因受剝削與制約而造成低度發展，中心國家的發展是因，邊陲國家的低度發展是果。

### 一一、擺脫依賴才能真正發展

依賴論者既然視「依賴」爲落後國家低度發展的元凶，則主張擺脫依賴以求得自主的發展，乃邏輯上之所必然。大致上說，依賴論者針對落後國家的低度發展所提出的發展方案，有兩種不同見解：一種是溫和革新主義者所提出的「社會改革方案」，他們大都是經濟學者，以阿根廷的普利畢許（Raul Prebisch）、智利的桑可（Osvaldo Sunkel）、以及巴西的佛塔多（Celso Furtado）爲代表。另外一種則是激進主義者所

主張的「社會革命方案」，以貝倫（Paul Baran, 1910--1964）和富蘭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為代表。

普利畢許是「社會改革方案」的首要代表人物。畢氏畢業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大學經濟系，後來在大學與政府機關服務，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三年間曾任中央銀行主管，一九四八年參與組織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ECLA），後來並成為該會主席。（註三一）基本上，畢氏把世界分成中心的工業化國家與邊陲的低度發展國家，由於後者受前者工藝技術、消費工具、文化形式以及意識型態等宰制，而招致發展遲滯，邊陲的發展只不過是中心資本主義的複製罷了。

爲了改善邊陲地區的經濟發展，畢氏提出四個發展策略：（註三二）

1. 以基層建設促進工業化；
2. 提高進口關稅，保護本國工業；
3. 實施進口替代；
4. 政府要扮演積極角色，以協調公、民營企業，克服各種發展之障礙。

桑可（Sunkel）視邊陲國家爲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之次級體系，它與中心的貿易結構（原料輸出與成品輸入）是經濟不穩定、停滯與貿易比率降低的原因，中心地區的發展與邊陲地區的低度發展代表資本主義歷史演進同一過程的兩面。（註三三）桑氏提出三個改革策略：即農業改革、運用主要輸出資助工業化，以及非以滿足少數統治人士消費需求的工業改革。

佛塔多（Furtado）認爲低度發展國家之落後情況，不是內發的或先天的，而是受現代資本主義結構滲透的結果。同時，低度發展社會結構中的統治階級常牽涉到許多利益團體，他們經常彼此對立，在國家發展計劃上竟見往往不能一致。佛氏於是提出「中央計劃」（Central planning）的策略來解決低度發展的問題。（註三四）

以貝倫 (Baran) 和富蘭克 (Frank) 爲代表的「社會革命方案」在立場上則主張，低度發展國家若要發展，唯一的途徑便是採用激進的革命手段，斬斷與資本主義體系間的關連，並擺脫依賴結構的制約。

所謂擺脫依賴，就實質意義而言，是指低度發展國家擺脫資本主義任何形式的制約。因爲資本主義對低度發展國家的制約是多層面的，它並不以經濟爲限。這種多層面的制約，正如柏格 (Peter Berger) 所說的是一種「依賴的綜合病徵」(Dependency syndrome) (註三五)，如果無法擺脫此綜合病徵，將很難見到真正的發展。

顯然地，依賴論者提出低度發展國家的發展策略雖然有異，然而他們視擺脫依賴爲發展之必要條件的看法，卻頗爲一致。

## 肆、世界體系結構中地位的躍昇：世界體系理論的觀點

一九七〇年代起，世界體系理論對於社會變遷的研究，引起廣泛的注意。它是由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教授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 所發展出來的，華氏雖爲非洲研究的專家，但一直要到一九七四年才爲大家所熟知，該年，華氏出版一本名爲「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 (註二六)的大作，受到相當的重視，次年，華氏並以該書獲得美國社會學會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的索羅金獎 (The Sorokin Award)。

世界體系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歷史與結構，而主題是研究長時期的社會變遷，特別是透過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形成、鞏固、擴張及第三世界發展之檢視與評估，以探討今日「西方強大」與「第三世界落後」之原因，並闡明兩者之間的關連。在學術上，世界體系理論則受到法國年鑑學派 (Annales school)、馬克斯主義之歷史研究和依賴理論等思想之影響。

## 一、世界是單一分工的體系

就定義上說，華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是「單一分工（Single division of labor）與多元文化體系的單位」（註三八），它起自於十六世紀的歐洲。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華氏強調，截至目前為止，世界體系只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世界帝國」（World empire），另一種則是「現代世界資本經濟」（The modern world-capitalist economy）。「世界帝國」以政治或軍事支配為基礎，如古羅馬帝國；而世界經濟體系則端賴經濟的支配，（註三九）沒有中央政治權威之控制。華氏曾指出，歷史上大多數的世界經濟都難維持穩定，它們不是導致衰敗的命運便是形變成世界帝國。唯獨現代資本主義已維繫了五百年而不改其面目。（註四〇）

世界體系論者認為此單一分工的體系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即中心（Core）、半邊陲（Semi-periphery）和邊陲（Periphery），這個「中心——半邊陲——邊陲」即成為世界體系的結構體。

首先，華氏從中心與邊陲的不平等交換關係著手，進而說明半邊陲在世界體系中之意義與功能。「中心——邊陲」概念是襲用自依賴理論，它所指的是某種相互關聯的生產過程組合，此一生產過程在本質上是不平等的，華氏曾強烈指出，「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內的貿易是先天性不平等的」（註四一）。因此，中心與邊陲之關係所指涉的便是剩餘價值朝著中心的方向作不平等分配的程度。這裡所謂之不平等分配或不平等交換（Unequal exchange）實乃指資本主義的壟斷與剝削的特性。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中心國家擴張（經由資本形成與不平等交換）的結果，將外在區域逐漸邊陲化（Peripheralization），成為邊陲國家。

「半邊陲」概念的加入，是世界體系理論與依賴理論兩者最大的不同處。所謂「半邊陲」，是指介於中心與邊陲間的中介國家（Go-between nations）（註四二）。在經濟上，「半邊陲」扮演雙重角色，即既為剝削者，又是被剝削者。半邊陲國家與中心及邊陲國家進行貿易，一方面輸出半成品產品到中心國家，並輸入高科

技成品，另一方面從邊陲國家輸入原料，並輸出成品到該地區。申言之，半邊陲國家與中心國家進行貿易時是被剝削者；而與邊陲國家進行貿易時卻又成爲剝削者。此外，半邊陲國家在整個體系中，具有緩衝的作用，是維持體系穩定的主要來源。

世界體系理論分析的取向著重歷史與結構，從而對歷史時間與地理空間的探究亦十分重視。所謂歷史時間 (Historical time)，它與物理時間有別，並非指涉時鐘或日曆上之時間，而是指在歷史上具有獨特意義的時間。華氏曾指出，在長時期歷史中，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兩件大規模的事，那就是「世俗性趨勢」(Secular trends) 和「循環性律動」(Cyclical rhythms) (註四二)。

在世界體系發展過程中的世俗性趨勢爲：(註四四)  
(一)資本主義擴張的性格，將原爲不屬於世界體系領域內之外在領域 (External arena) 不斷地納入世界體系之中。

(二)土地，勞動及自然資源的商品化過程，使得市場在質上愈形擴大。

(三)生產過程中機械化的趨勢，這是工業革命及其後之第二次工業革命 (或科技革命) 以來的趨勢。

依照華勒斯坦的看法，「世俗性趨勢」多少爲直線形的過程，而「循環性律動」則多少爲隨時間而不斷重複的事物。(註四五)「循環性律動」是指世界經濟的循環過程，在經濟學的傳統上，被稱爲商業循環 (指世界經濟的景氣和蕭條)。因此，相對於世俗性趨勢而言，循環性律動只不過是大趨勢下的小趨勢而已。

地理空間在世界體系理論中有兩種義涵，一個是作爲解釋上用的，另一則意指人類生活之活動場所。前者可闡明歷史事件中地理因素所扮演的角色，例如，華勒斯坦在討論十五世紀末歐洲之社會危機時，認爲葡萄牙之所以首先展開航海探險，主要因其近海，且其沿岸有一洋流，易於出海謀生；地理空間意指人類生活之活動場所時，必須採用整體的觀點。如世界體系中之中心，半邊陲與邊陲三個空間上的結構，雖分屬不同的地理位置，彼此間卻有互動，而且各有其功能存在。

## 一一、發展是結構中地位的躍昇

世界體系理論分析的單位不是個別的國家，而是以所有國家所構成的總體關係，也就是「世界體系」。由中心、半邊陲和邊陲三個層級結構組成的世界體系，其動力之來源是市場的交流機能。體系中的三項結構（指中心、半邊陲與邊陲）是具有動態性的，它們在體系中形成分工的現象，同時亦是國際階層化的結果。世界體系論者都假設，世界上所有的區域建構成一個單一而持續的世界分工，它的交換基礎在於對剩餘資源的微收和佔有。所以，在世界體系內位置高低的安排是由此一交換地位所決定。申言之，每個國家累積資本或發展的可能性，是受它在世界分工中之結構位置所限制的。（註四六）易言之，國家受世界體系的結構限制是命定的（Determined），一個國家的發展與低度發展只有在此一體系中表現，它並不能突出於結構範圍之外的。顯然，在世界體系論者看來，國際階層化已成爲世界體系的基本特徵，同時又是維持體系生存與延續所必要的結構性安排。

儘管世界體系論者把大部分的篇幅用於探討世界體系的形成、鞏固與擴張，但是並未完全忽視對國家的討論，祇是世界體系論者強調，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必須在世界經濟的脈絡裡加以理解。

國家在世界體系結構中位置的變動是被允許的，從歷史經驗中亦可以得到驗證。華勒斯坦認爲，任可國家在世界體系裡位置的變化（如由半邊陲到核心，或相反）雖然不會改變體系本身，但對某些國家而言，即是所謂的「發展」或「進步」。（註四七）這樣的語句在意涵上顯得相當曖昧，因爲這樣似乎是在預設：凡是國家在世界體系中之位置有所變化（無論是由邊陲到半邊陲或由中心到半邊陲）均可稱爲「發展」，如此一來，中心國家往邊陲地區的變化也稱爲「發展」嗎？

關於這點，賀布金斯（Terence hopkins）與華勒斯坦在「當代世界體系的發展模式：理論與研究」文中更進一步指出「在某些國家內，主要的經濟活動種類依時而變，有時是因爲政治界限的改變，但較常發生的原

因是在世界經濟的循環模式中，於特殊的轉捩點上，國家會有計劃性的行動，及以國家為基礎的私人活動。國家可以被比喻成是有向上或往下『流動』的現象。向上流動經常被稱為『發展』」（註四八）可見在世界體系理論的內涵裡，國家發展是指國家在世界體系結構中地位的向上躍昇。當然，有某些國家的向上躍昇，就有某些國家的下降流動，因為國家在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雖然改變了，但體系中的角色分佈狀態（中心、半邊陲、邊陲）卻一直不變。此外，華勒斯坦認為，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不能讓全部的國家都同時發展，因為體系中的功能運作是不平等的，而且有中心和邊陲層級之分的。

## 二、體系運作窒礙國家發展

國家從世界體系結構中地位的躍昇固然得以發展，不過，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剝削特性和體系中的結構限制，發展並非任意可得。世界體系在運作過程中，經由不平等交換關係，將對邊陲國家產生從外到內的層層制約，形成該國家發展的種種障礙。

世界體系論者大致上認為，不平等交換的產生是由於中心國家與邊陲國家間勞工生產力的差異所致。邊陲國家生產的商品與中心國家生產的商品在互換過程中產生價值的流失。因此，兩者間之交易，不可避免地導致價值和資本從邊陲國家外流到中心國家。（註四九）此乃阻礙了邊陲國家的資本累積。不平等交換的過程對邊陲國家的內部至少造成三種不利於發展的弊端：

（一）社會力的扭曲：當邊陲國家被納入世界經濟時，產生地方性的、寄生性的團體，它們是外國經濟剝削本國經濟的中介人，由於它們與外國經濟的聯合，乃壓抑了本土工業的發展。

（二）結構分化受阻：社會結構的分化基於其本身自我推動的傾向，對經濟發展產生有利的影響。然而，邊陲國家基本原料和未加工物品的專門化卻阻礙了社會結構的分化。（註五〇）

（三）政府功能的扭曲：華勒斯坦以世界分工的經濟決定論來看政府結構，認為邊陲國家的政府功能主要是將經濟剩餘從邊陲轉移到中心。如此一來，政府對於本國的發展便無法產生主導作用。

可見邊陲國家的發展是不容易獲致的，但不容易並非不可能。華氏提出三種發展策略供邊陲國家作參



考，它們是「奪取機會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seizing the chance)、「引誘振興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promotion by invitation)，以及「自賴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self-reliance)。(註五一)「奪取機會」是古典的方法，與國家資本主義的策略相似，包括侵略行動，將國家轉型為較佳的結構。「引誘振興」的策略以既存的利益為基礎，如降低工資。「自賴」的策略是內求的，在世界體系中不容易成功。

## 伍、結語：多重觀點的概念架構

上述三種研究範型(Paradigm)(即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在詮釋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時，由於學術背景、時空環境，以及理論出發點等方面之差異，所觀照的國家發展面向亦互有軒輊。就某種程度言，它們都具有局部性的解釋力，相對地，它們在某方面亦各有限制。這種情形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裡並非特例，此乃受社會科學研究者能力和時間上之限制所致。因為社會科學家們即使窮其一生，殫精竭慮地來建構理論，亦無法提出一種能面面俱到來解釋瞬息萬變的社會現象之一般性理論(General theory)，充其量，祇能經由不斷批判和反思的過程，使理論愈臻充實周延，進而強化其解釋力，使之更接近社會現的眞貌。

基於此，就發展社會學三個理論在詮釋國家發展時所持之觀點加以批判反省，從而釐出一較寬廣而周延的觀點，對學術研究和經驗分析而言，都具有相當的意義。

### 一、內部因素的發展理論

現代化理論在學術傳承、方法論、意識型態和經驗上，都遭到許多批判，(註五二)這無疑是研究上的正常情形。不過，本文要特別指出的是該理論在觀點上的偏誤。現代化理論視每個社會(或國家)為單一獨立自主的個體，進而用「傳統——現代」的概念來探究社會發展或遲滯的內部因素，完全忽略了影響社會發展的外在制約力量(或因素)。這與該理論的基本預設有關係：即國家或社會的發展是獨立自主的，可以從階段甲至階

段乙，終而達到現代化的目標。職是之故，當它被用於詮釋國家發展時，必然存在許多盲點；而據此所提出的發展策略自然也是弊端重重了。

將現代化理論這種忽視外在因素影響的觀點，用來研究第三世界的國家發展時，其限制與缺點更爲明顯。因爲任何理論架構如果忽略了戰爭、征服、殖民統治、國際間的政治與軍事關係、國際間的貿易及資本流動等重要因素的影響，就不能瞭解及解釋這些社會興起的原因。（註五三）可見在互動頻繁且交通管道多元化之今日，國家要完全獨立自主發展而毫不受外在因素（國際間之互動）影響，似無可能。

尤其，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與其早在帝國主義強力制約下的歷史經驗是息息相關的，必須加以銜接起來檢視方能獲得周延的理解。何況這種制約情境在二次大戰後仍然可能對第三世界國家發生影響，只不過制約的方式和強弱程度不同罷了。因此，單從內在因素來詮釋國家發展，其解釋力是不足的。

此外，現代化理論亦忽略了第三世界國家與西方國家間許多自然存在的差異，例如地理分佈、氣候、資源蘊藏、國民性格、歷史經驗，以及文化的「生機控制性」（註五四）等。這些差異若用來批判該理論的某些論點（如單一演化、聚合發展論）時，是很具威力的。

雖然如此，現代化理論仍然有其貢獻和價值：

首先，它有助於非西方社會（或個人）對西方國家發展經驗的理解，同時對非西方國家的發展亦具參考（非模仿）價值。現代化理論以西方經驗來詮釋第三世界之國家發展，具有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偏見的意識型態，固爲常情。不過，他們以「生於斯，長於斯」之自我經驗與學術能力來剖析他們自己社會的發展，若非蓄意扭曲真象，則其洞識力和見解是可以肯定的。因爲對西方發展經驗的真實描繪是建構該理論的前提。非西方社會可以從該理論中理解到西方社會何以成爲今日西方社會的內在因素，若能再配合外部因素的澄清，便能充分掌握西方社會發展經驗的全貌。

同時，在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裡必有某些優點是值得非西方國家參考的。非西方國家可以從中擷取有利的經驗，以促進其自國家己的發展，因之，若有值得採借之處，萬不能以民族主義爲由而拒斥之。

其次 就學術研究言，現代化理論將研究範圍擴展至非西方國家，刺激學者專家對該地區發展之研究，如後繼的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此外，現代化理論中的許多缺點（如二分法、種族中心主義觀點：：等）對學術研究者而言，具有警示或啓示作用，雖然此一作用並不是現代化論者的原意。

### 一、外部因素的發展理論

相對於現代化理論對國家發展內在因素之重視，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對於國家發展的外在因素則情有獨鍾。

依賴論者採用一種「由內向外看」（實則由拉丁美洲向外看）的觀點，據以探討拉丁美洲國家低度發展之原委，從而推出「西方國家（中心國家）的發展是因，拉丁美洲國家（邊陲國家）的低度發展是果」的結論。此一重視國家發展外在結構限制的分析觀點，本可匡正現代化理論偏重內在因素的缺失，然而由於依賴理論矯枉過正，反而使其解釋力受到相當的限制。

從批判的立場來看，依賴理論重視中心地區及世界體系如何影響拉丁美洲的國家發展，充其量祇是對於拉丁美洲發展的具體分析罷了，（註五五）它並非形式理論。依賴理論用國際經濟為中心的社會結構觀，未考慮到國家內在勢力的自主性以及它們在變遷過程中的潛在力量，認為第三世界（尤指拉丁美洲）國家之低度發展是外在勢力（國際經濟體系的制約）之邏輯結論，（註五六）因而主張從外在制約情境中解脫。事實上，所有的歷史證據都指出，每個國家或政府在某些情形下，都有或強或弱的能力去肆應劇烈的變遷。依賴論者無視於個別國家的內在動力，正如現代化論者忽視外在結構制約一樣，都犯了偏執的謬誤，對理論的另一項缺點在於它所提出的國家自賴途徑，此一主張使得國家在尋求自賴發展過程中，必須設法擺脫或避免與中心國家之互動，同時要積極向內尋求。可是，一個國家在今日世界經濟網絡中，很難不受影響。尤其，若以世界體系論的觀點，世界是一個單一的分工體系，個別的國家祇不過是其中一個次級體系而已，要獨立自賴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不過，依賴理論若作為一種批判的學派是有其價值的。在現代化理論領導發展研究的當時，依賴理論所提出的批判觀點，其意義不在其學術成就或理論的解釋力，而是代表國際社會中弱國的呼聲。

至於世界體系理論，它採用「由上往下看」的觀點，探討和分析的單位不是個別的社會或國家，而是「世界體系」；在理論中，個別的國家或社會被視為是體系中之次級體系，國家發展的外在因素，不能單以「中心——邊陲」的連帶關係來決定，而是以該國在世界體系中所佔位置所帶來之結果。低度發展國家在世界經濟結構位置上之移動，有賴於整個體系內階層（即核心、半邊陲和邊陲）的流動。雖然世界體系理論對國家發展的詮釋並未完全忽略國家內部結構的變動所帶來之影響，但畢竟不是它理論的重點。就整體看來，它和依賴理論一樣，都偏重於外部因素的分析，只不過是將國家發展（或低度發展）置於整個體系中來討論罷了。

### 三、互補的多重觀點概念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發現，發展社會學中的三個理論，在詮釋第三世界的國家發展時，正好採用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現代化理論是一種內部因素的發展理論，而依賴和世界體系兩理論則屬外部因素發展理論。前者著重內發性變遷，強調內部因素改變的影響；後者從國家間的關係或世界性的觀點來分析，強調外部因素的重要性。無論是內部因素理論或外部因素理論，它們之間優劣互見，也都是片面性的理論。如果單獨擇一來詮釋國家發展，都只能獲得部分的理解，因為它們各自觀照了一個面向。因此，必須統合兩者的互補（不是綜合）性格，兼顧內部和外部因素，進而採用多重觀點（Multiple perspectives）的概念架構，（註五七）對於國家發展才能有較用周全的瞭解。尤其在制訂國家發展策略的過程中，運用多重觀點將可避免倚輕倚重之弊端。

## 註釋

- 註一：最早使用「第三世界」一語者，為阿爾及利亞的學者方濃（Frantz Fanon）；有關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以及第三世界的特質，見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再版，第六頁。
- 註二：Dean C. Tipps,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Cyril E. Black ed.,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6), P.63.
- 註三：張家銘，社會學理論的歷史反思（台北，圓神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初版），第一三九—一四〇頁。
- 註四：Ankie M. M. Hoogvelt,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978), PP. 11-14.
- 註五：Talcott Parsons, Social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P. 101.
- 註六：Alejandro Portes, "On 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Issu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1. 1976, PP.55--85.
- 註七：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1), PP.58--67. 台北：橋樑出版。
- 註八：Wilbert E. Moore, World Modernization: The Limits of Convergence (New York: Elsevier, 1979), P.26.
- 註九：Hoogvelt, op. cit., P.50.

註一〇：Talcott parsons,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1), P.26.

註一一：蔡文輝，社會變遷（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二年九月），第一〇一頁—一〇二頁。

註一二：Anthony D. Smith, The Concept of Soci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P.18.

註一三：Portes, op. cit., P.63.

註一四：Ibid., P.68.

註一五：威納爾（Myron Weiner）編，林清江譯，現代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年五版），第一〇—一八頁。

註一六：Portes, op. cit., P.70. 另參閱江炳倫，政治發展的理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五版），第一一七—一九頁。

註一七：Protes, op. cit., PP.70--71.

註一八：蔡明哲，社會發展理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一版），第二七頁。

註一九：龐建國，「從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看中華民國台灣之發展——兼論孫中山先生之國家發展學說」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學術論叢，第六期，民國七十五年十月，第一七六頁。

註二〇：同註一八，第三六一—四四頁。

註二一：鐸山多士（T. Dos Santos），「依賴結構的分析」見蕭新煌編，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一版），第一七一頁。

註二二：Walter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London: Bogle-I'Ouventure, 1973), PP.21-22. 轉引見呂亞力，政治發展與民主（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五年六月三版），第八四頁。

- 註一三三：Ronald H. Chilcot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84), P.10.
- 註一三四：法蘭克 (A. G. Frank) , 「低度發展的發展——依賴理論的基本假設」見同註一一，第一六〇頁。
- 註一三五：Hoogvelt, op. cit., P.68.
- 註一三六：Ibid., PP.69--71.
- 註一三七：Ibid.
- 註一三八：Eva Etzioni-Halevy, Social Change-The Advent and Maturation of Moder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1), P.72.
- 註一三九：韋爾伯 (Charles K. Wilber) , 衛佛 (James H. Weaver) 「依賴的模式：所得分配與低度發展」見同註一一，第二三八頁。
- 註一四〇：同註一一，第一七二——一七九頁。
- 註一三一：Chilcote, op. cit., P.23.
- 註一三二：黃新生，「依賴理論介紹」，中華雜誌，二六四期，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另見Chilcote, op. cit., PP.26--27.
- 註一三三：Chilcote, op. cit., 29--30.
- 註一三四：Ibid., PP. 32--35.
- 註一三五：彼德·柏格 (P. Berger) 著，蔡啓明譯，發展理論的反省——第三世界發展的困境 (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二年二月)，第五〇頁。

註二六：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 Y.: Academic Press, 1974).

註二七：胡克威，「世界體系理論初探」，思與言，二十一卷，六期，民國七十三年三月，第二二—二七頁。

註二八：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 (september) 1974, P.390.

註二九：George Ritzer, Sociological Theory (N. Y.: Alfred A. Knopf, 1983), P.291.

註四〇：Neil Smelser,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84), P.370.

註四一：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 System Analysis: Theoretical and Interpretive Issues." in Barbara Hockey Kaplan(ed.), Social Change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London: Sage. 1978), P.220.

註四二：Ankie M. M. Hoogvelt, The Third World in Global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1982), P.193.

註四三：Immanuel Wallerstein, 1978, op. cit., P.232.

註四四：胡克威，同註二七，第四〇頁。

註四五：Immanuel Wallerstein, 1978, Ibid.

註四六：伊文斯 (Peter Evans) ，「超越核心和邊陲：評世界體系理論」載見同註二一，第四二四—四二五頁。

註四七：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當前對世界不平等的爭論」載見同註二一，第三二—三三頁。

註四八：賀布金斯 (Terence Hopkins) 、華勒斯坦，「當代世界體系的發展模式：理論與研究」載見同註二一，第三二—三五頁。



註四九：許嘉猷，「世界分工與國家發展——世界體系理論的評介」，思與言，二〇卷一期，民國七十一年五月，第六五—六六頁。

註五〇：同註四九。

註五一：Hoogvelt, 1982, *op. cit.*, PP.194--195；另見蔡明哲，同註一八，第六五—六六頁。

註五二：Hoogvelt, 1976, Part one; John G. Taylor, From Modernization to Modes of Production--A Critique of the Sociolog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1979), PP.21-25; Tipps, *op. cit.*, PP.68-84.

註五三：徐正光，「發展社會學——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社會科學家對於發展問題的探討」，台北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四卷四期，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第七九頁。

註五四：所謂「生機控制性」乃指一個個體或社群所具備保證自身或其成員足以控制外在環境，來維持獨立生存的機會和保證人格發展的有利條件的程度。以帕森思（Parsons）之概念來說，即一個個體或社群保證具有獨立而自主地調適環境、獲取目標實現、維持整合和貫徹具個性之文化模式的能力。見葉啓政，「邊陲性與學術發展」載李亦園等編，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初版），第二三〇頁。

註五五：G. Palma, "Dependency: A Formal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or a Methodology for the Analysis of Concrete Situation of Underdevelopment", in World Development, Vol. 6, 1978, PP.881-924. 轉引見同註二七，第三五頁。

註五六：Portes, *op. cit.*, PP.78-79.

註五七：馬康莊，「發展理論的重建：多重觀點的概念架構」，當代，第七期，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第九一頁。